

■ CONG TUHUO DAO GUOHUO
JINDAI XIAOFEI XINGWEI ZHENGZHUIHUA
YU MINZU ZHUYI SICHAO

从土货 到国货：

近代消费行为政治化
与民族主义思潮

王 敏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CONG TUHUO DAO GUOHUO
JINDAI XIAOFEI XINGWEI ZHENGZHUIHUA
YU MINZU ZHUYI SICHAO

从土货 到国货：

近代消费行为政治化
与民族主义思潮

王 敏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土货到国货：近代消费行为政治化与民族主义思潮/王敏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8
ISBN 978-7-5130-2244-6

I. ①从… II. ①王… III. ①抵货运动—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F729.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7389 号

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近代消费行为政治化与民族主义思潮。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这片梦想中的广阔市场开始彻底暴露在西方列强的眼中，大量涌入的洋货使中国传统土货的市场份额不断降低。在此背景下，国货成为耳熟能详的词汇，国货和洋货由于生产者不同而被打上了鲜明的国别色彩，用国货还是用洋货不仅仅是选择商品，也是选择某种社会政治立场。抵制洋货、倡用国货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此起彼伏的国货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令人醒目的现象，提倡全体国人消费国货，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来表达民族情感。“国货”出现的思想背景是“商战”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国人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消费的对象——商品被打上了主权国家的标志，商品不再简单地仅仅是物本身，其成为国家的象征，这无疑爱国表现的表现。在国家武力不足，外交乏力的背景下，国人自发地选择经济领域的“国货”对抗“洋货”，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

责任编辑：宋云

责任出版：谷洋

从土货到国货：近代消费行为政治化与民族主义思潮

王敏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责编电话：010-82000860-8388	责编邮箱： hnsongyun@163.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75
版 次：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10千字	定 价：42.00元

ISBN 978-7-5130-2244-6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在《国货洋货》一书的开篇，有这样一段话：“倘若有人从本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个晚上睡去，而于80年代末期的一个早晨醒来，他一定会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惊呆了。他无法想象中国的公路上到处奔驰着西方生产的豪华型轿车；无法想象中国商店的显著地方陈列着千姿百态的进口化妆品，国内同类产品只能屈居其次；更无法想象许多优质的国产电子产品只是由于舶来品的竞争生产一直处于停顿状态……”^①这段话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后“洋货”大量进入中国，直接改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事实。事实上，早在1840年以后，“洋货”就已经大量出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其后“洋货”的泛滥与国货的疲弱引起了国民前所未有的关注。可以说，对“洋货”的消费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消费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是每个社会、每个人、每一天都要从事的活动。一眼看去，消费是最简单、平常的事情。事实上，消费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行为，也不仅仅属于经济学范畴，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消费行为也因此成为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交汇点，“消费”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消费行为的变迁涉及时代的变迁，人们消费什么、如何消费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社会的影响，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制定的消费制度、社会主流话语等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共同塑造着个人的消费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规范着个人的消费行为。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依靠世俗权力来安排和配置资源的社会，自古以来，从王侯将相到普通百姓，消费行为都要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中国人在漫长的大一统的专制统治

^① 陶现定：《国货·洋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中，对各种关于消费的规定已习以为常。如，商纣王的酒池肉林成为历代帝王的经典反面教材，过度的消费被认为会带来痛失天下的后果，帝王的消费也要受到家国天下的约束。至于普通百姓的消费更不是随心所欲的，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统治者要求个人按照阶级出身进行穿戴。晚清以来，中国以落后者的姿态被迫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中，在巨大的外部压力的作用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人们的生活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自由，消费行为又将如何重组中国社会并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近代中国面临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共同阻碍，面对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时代问题，其困难与艰巨难用言语形容。民族危机催促中国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每一个中国人逐渐认识到没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什么事都办不成。因此，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近代史上最醒目的任务，爱国主义成为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合力下，消费行为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商品带上了鲜明的国别色彩。当国家武力没法完成保护国家主权完整的任务时，消费这个之前仅被视为经济、文化方面的概念，逐渐打上了国家、民族、主权等因素的色彩，并上升到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联姻的高度，担当起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的重任。传统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对象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伴随着时代的巨变，消费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几乎在每次中外关系明显受挫时，作为抵抗的消费都显示出重要的作用，国内都会爆发大规模抵抗洋货的运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严格限制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洗刷外国武力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耻辱感。因此出现了“国货”与“洋货”的截然对立，国货运动的提倡者不断说服自己的同胞购买国货，不仅要在行动上抵制洋货，更要从内心里厌恶洋货。一个最好的办法是将产品与国别、民族等宏大词汇联系在一起，强制性地给消费者普及民族主义的概念，通过消费和不消费“洋货”的行为将大众划分为爱国和不爱国的两类人。因此，用国货还是用洋货不仅仅是选择不同商品的消费行为，而且是选择某种社会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被作为一种政治倾向的标志。

在国家主权遭受威胁的关键时刻，无数中国人自愿遵守民族主义消费行为准则，强调进行消费时应自觉维护国家尊严。国货运动培养了国人的国货意识，提醒人们在政府之外的中国人能把对外政策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消费行为来表达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不可否认，国货意识是一种爱国信念和思想觉悟，是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国货运动提倡以国货抵制洋货，为民族工业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促进了近代中国异常薄弱的民族资本力量的发育，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国货运动宛如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消费行为可以折射出国家、民族、主权等因素，但永远也无法取代它们的地位，更不可能独立担当国富民强的重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失败，深层次的原因是两者实力悬殊：是传统农业生产的经济落后国家与工业发达的现代国家、古老陈旧的武器与新型的炮火的对比，其胜负早已是不言而喻的。“洋货”不得不在近代中国担当一个尴尬的角色：它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经历了被妖魔化的想象过程。一个我们因民族感情而不愿承认但存在的事实是：只有当我们开始虚心认识和学习来自西方的先进知识时，才可能是中国摆脱贫弱状况、实现强国梦的开端。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任何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反抗最终都是徒劳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洋货”打败国货的结局。“洋货”代表着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必须使用的洋货越来越多，如洋火、洋电、洋针等物，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使更多的人被纳入西方物质文明影响的范围之内。与之相应，“洋”开始获得了正面的含义，“洋”相对于“土”而言是现代的（直接音译为摩登）、时髦的，如“洋气”、“土洋结合”等。时至今日，中国已融入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浪潮中，片面强调抵制洋货已经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缺少了必要的理性基础。在今日中国，我们应该拥有足够的自信去拥抱世界，而不是在抵制洋货声中闭守国门。

目 录

第一章 从“土货”到“国货”	1
第一节 鸦片战争与“洋货”的入侵	4
第二节 土货与国货	19
第二章 消费行为政治化与国货运动	37
第一节 政治化的消费行为	40
第二节 国货运动与国货团体	48
第三节 国货运动的历史功绩	57
第四节 国货运动有限的历史功绩	64
第三章 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洋货想象	77
第一节 民族主义思潮	80
第二节 关于“洋货”的集体想象	89
第四章 洋货与中国的现代化	111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中的“洋货”	114
第二节 洋货与现代生活观念的建构	141

第五章 消费行为政治化的影响	163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度安排下的消费行为	166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后的消费制度安排	176
附录一: 国货运动大事记	190
附录二: 国货团体活动简表	192
参考文献	201

第一章 从『土货』到『国货』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这块梦想中的广阔市场开始彻底暴露在西方列强的眼中，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我国而来的洋货进口狂潮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为防止西方商业入侵设立的壁垒完全坍塌了，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变化是性质的改变：1842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控制在清王朝手中，由它授权的公行操作；1842年以后，控制权转移到西方国家的商人手中，进行操作的是这些商人开设的洋行及其雇佣的买办。自此之后，中国市场被卷入世界市场，并依附于世界市场，这使中国的生产者遭受了巨大损失。

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被逼到受侮辱和行将灭亡的绝路，民族主义意识觉醒，民族主义思潮起伏。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一系列战争，使中国成为西方各国共同压迫的半殖民地，被炮火吓坏了的清王朝根本无力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抗争。1899~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的最终惨败，使社会上下认识到直接以武力对抗外国的方式不可行，对外战争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国人对国家、民族独立富强的要求日益强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无数先觉的中国人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提出了各自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西方国家普遍的“经济强国”路线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尤其是在历次战争中，腐朽的清朝政府都不能战胜列强，与西方进行武力抗衡是自取其辱。在国家武力不足、外交乏力的背景下，国人自发地选择经济领域的“国货”对抗“洋货”，将消费国货作为一种反抗与自救的方式。“国货”出现的思想背景是“商战”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国人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消费的对象——商品被打上了主权国家的标志，不再简单地仅仅是物本身，而成为国家的象征。国人希望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列强的经济入侵，进而维护国家的主权。这无疑是爱国的表现，但也

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同时催生了伴随中国近代史始终的国货运动。随着民族资本力量的发展，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抵制洋货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此起彼伏的国货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令人醒目的现象，这种特有的民族主义符号体系通过社会舆论进行广泛动员，提倡全体国人消费国货，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来表达民族情感。

第一节 鸦片战争与“洋货”的入侵

一、危机四伏的天朝上国

鸦片战争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西方以互不影响或影响甚微的方式各自发展，中西方的贸易往来时有时无，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一直维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也一向自诩为天朝上国，余外皆为“蛮夷”，长此以来存在的优势使中国统治者甚至是普通民众都坚信中华文化制度远胜于“西夷”，中国人习惯以居高临下的视角环视四方，把西方文明当成海外奇谈。可以说，中国的整个历史就是形成并巩固“天朝上国”这一理念的历史，除中国之外的一切国家都是愚蠢、野蛮、未开化之邦。因此，中国主动地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到18世纪初，清王朝在对外交往方面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东西文化交流因此堵塞了100多年，导致当政者及士大夫对世界知之甚少，中国与西方诸国正常的邦交往来也被归到“化外蛮夷之邦”的观念结构中去。虽然时局渐变，但我们根本无视甚至是否认那个日益强大的西方世界，固执地不想与西方国家发生任何联系，对海外市场的意义更是彻底无视。而当时的世界发展状况是，进入18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19世纪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踏步地朝着现代国家快步前进，工业业的进步使商品市场变得异常重要，每个国家无不渴望扩大海外市场，它以死亡的威胁使经济落后的国家适应新的世界环境。“资本家阶级已经不仅要求掠夺现成的财富，而且要求开辟世界上一切国家为

它的市场。”^①

在15世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能比得上中国文明的先进与发达，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出口多，进口少，有大量贸易顺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GDP总量的优势一直保持到18世纪中叶。1750年，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中国占32.8%，整个欧洲占23.2%，日本占3.8%，美国仅占0.1%。”^② 中国市场在世界市场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中国的工艺技术一直比西方先进和精美，西方国家拿不出可以在中国市场大量多销的商品，而中国独有的丝、茶、瓷器等商品一直是西方上层社会的奢侈品，是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畅销货。这使在中西贸易关系中，中国长期出超，西方国家处于不利地位，要用白银向中国购买商品。尤其是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激动人心地记载了关于中国的见闻，以大量的篇章和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这些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新航路开辟之前，西方与东方的交往只能通过陆路进行，由于陆路交通的困难和运输条件的限制，贸易只能限于体轻、价贵、利润高的特种奢侈品，商业规模一直未能扩大。自从土耳其灭亡东罗马帝国，切断东西交通以后，东西贸易几乎陷于停顿。为了获取东方的货物和金银，欧洲商人多次冒险，努力寻求一条通往中国和印度的通道。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1498年达·伽马发现了好望角，自此之后，通往中国与印度的海上航线出现了。海上运输商品的载重量远远超过了陆路，这使得商品交易不再仅限于奢侈品，也不断刺激着商品价格的下降和消费者的增加。这标志着商业性质变了，商业利润不再依靠奇货暴利，而是依靠大量多销。

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制度已在英国得到确立并继续发展，同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促使英国经济开始向近代经济转型，英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西方资本主义要求打开一切闭关自守的国家的通商大门，让其商品自由出入，而中国是当时最后一个没有被打开通商大门的最有希

①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②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望的大市场。长期以来中国的强大与富有使整个西方国家希望开拓中国市场，他们对中国市场抱有一种虚幻而又强烈的希望。“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互相议论说，只要想到这件事：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只要英国能找到一个安全港口，能夺得一个岛屿并将它变成一个受英国保护的弊绝风清的货物集散地，那就好了。”^①尤其是工业革命使英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英国产业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英国的机制工业品泛滥全世界，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中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成为英国工商界梦寐以求的一块肥肉。然而由于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基本上用不着外国货，所以直至19世纪中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然而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经济上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壮大，导致了长期以来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自商鞅实行以农业立国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都遵从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对商品经济的依赖成分很少，这养成无待外求的心理，对一切精巧的事物更是称之为奇淫巧技，是不屑一顾的。尤其是为与俭朴的物质条件相适应，中国统治者历来提倡崇俭黜奢的消费观，在中国传统道德评价体系中，俭是善，奢历来是腐化的源头。正如孔圣人评价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安贫乐道就是君子所为，勤俭节约被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之相反，奢是万恶之源。因此，只有满足人基本需要的消费是合理正当的，除此之外都属于欲壑难填的内容，节制欲望成为时刻需要注意的道德规范，社会的奢靡风气甚至受到国家法律的干预。

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和节俭的消费习惯使西洋生产的商品找不到出路，与此同时，我们对国际贸易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清王朝包括普通民众认识不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反而认为西方国家一定需要中国的大

^① [美] 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6页。

黄、茶等产品。与其说我们卖大黄、茶等产品给西方国家是进行经济贸易，不如说是一种恩赐。当时的天朝人有着一种无知的自大，对西方国家的商人及其贸易活动实行严格的管理和限制政策，采取减少与西方国家商人、传教士接触的办法，幻想以这种方式保护国家安全。可惜的是，清王朝的统治者没有认识到：世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顺应潮流，奋起直追，重新站到世界潮流的前列。长期形成的传统使清王朝的统治集团没有看到中外经济关系出现的新局面，闭关锁国的政策已经失去作用，西方列强不惜用武力来改变这一现状。

17世纪以前，中国长期是海洋大国和海洋强国，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胜过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可惜的是，明王朝在结束郑和下西洋之后，却转过脸去，背对海洋，背对世界，丧失了充当海洋大国和开拓世界市场的领头羊的机会。清王朝更是发展了这一保守趋势：

顺治十二年题准：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至单桅小船，准民人领给执照，于沿海近处捕鱼取薪，营泛官兵不许扰累。^①

1681年平息“三藩之乱”，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后，国内基本安定，1684年放开海禁政策。清王朝因唯恐海上贸易带来边境安全，于1717年下令禁止大陆人民到南洋经商，因禁令难以坚持，只得于1727年废除，但仍然对海上贸易有重重限制：

出海贸易之禁已开，其先定处分之例，挈获奸民议叙之条，俱行停止。凡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等省民人，情愿在海上贸易捕鱼者，许令

^①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乘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仍于各口出入之处，豫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给发印票。令防守官员验票贴数，准其出入。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①

1757年，清王朝决定从海上来的欧美客商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限制从海上来的西方商人与中国市场直接接触。1760年，清王朝授权公行作为官府向外商征税的代理人，并负责管理、约束外商，清王朝官员通常不与驻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进行任何直接接触，与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由公行居间转达。可以说，公行掌握了贸易价格、货物种类和数量等方面的特权，这使西方贸易受到重重限制。西方商人来华只能根据限令居住在特定的夷馆（factory），并且必须由公行商人代其办理验货、报税、请照、采购日常用品等活动。

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唯一机构，中国散商贩卖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然而散商地位已日益重要，其交易量每年十分巨大。织造丝绸、土布、绸纱、夏布与其他许多次要物品的散商，获利极大；但依照官章，散商只限于供应外侨个人的必需品。事实上，官厅照例常常提醒散商应遵守定章，甚至列举允许他们卖给外人的货物品种，如衣服、雨伞、草帽、扇子、靴子之类。^②

外商只能在特许日出行，必须接受监视，同时规定不得携带家属，不得随意游历，不得进城，不得坐轿，不得学华文华语，不得直接会见官

①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页。

②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9页。

府，其行动自由的范围极度有限。^① 清王朝实行这种政策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具有自卫的性质，但这种严格的限制与管理并不能让西方资本主义停止发展的脚步，他们以越来越快速的姿态要求打开中国的国门，使其商品自由出入。

清王朝不谙此种形势，不善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处理新的对外事务，“没有将加强防卫、反对侵略与发展对外贸易，既予以区分，又结合起来；没有主动地发展对外贸易，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落后，通过对外经济联系，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迎头赶上。它所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落后的自卫措施。这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②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国强大的国力面前，西方在中国一直寻求和平发展贸易的途径。在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中，英国占主要地位，因此英国最急于摆脱广州十三行的贸易限制，寻求扩大贸易往来的机遇，他们首先希望以合法的途径与中国进行正常、平等贸易的合作。清乾隆时期，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携带精心准备的礼物，请求协调通商等外交事宜。在马戛尔尼来华之前，英政府表明要他竭力造就中国礼俗的训令，但乾隆把英国当成蕃属国看待，作为蕃属国贡使的马戛尔尼自然要行跪拜礼。在马戛尔尼拒绝后，使者携带的大量贵重礼物——当时价值 13124 镑的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图画、毯毡等奇巧之物，也未能改变乾隆对英国使者的态度。这次交涉因马戛尔尼不肯向乾隆下跪叩头而失败了。乾隆很不高兴地要求他离京回国，对他提出的要求更是全部拒绝，英国第一次和平交涉算是完全失败了。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的机会白白浪费了。等到英国第二次派遣使者来华，交涉的目的与第一次大致相同，嘉庆对使者的待遇还比不

①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69 - 70.

②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页。